

中文版序

這本關於城市、革命和文化的書，得以翻譯為中文出版，我感到非常榮幸和高興。當該書英文版面世的時候，魏斐德 (Frederic Wakeman Jr.) 曾評其為「繼李侃如 (Kenneth Lieberthal) 和傅高義 (Ezra F. Vogel) 研究天津和廣州之後，論述共產黨解放中國城市最好的一本書」。¹ 鮑德威 (David D. Buck) 認為，「這本書將成為解釋共產黨接管中國城市的一個標本著作」。² 對該書之所以大加褒獎，一方面在於他們看重本書對史料的挖掘，另一方面在於他們贊同作者的理念：共產黨接管城市不僅是政治事件，還是一個文化事件。1949年共產革命的勝利不僅僅建立了新的政治制度，也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、主流話語甚至審美追求。在美國的中國學領域中，以往研究中國革命的著作，大多局限於對政治和經濟的描述；而時下許多研究中國文化的著作，又刻意地避開中國革命的背景。革命史和文化研究似乎成了兩個互不相干的領域。我的這本書則不同，它把城市革命和文化變遷視為共產黨接管杭州的同一過程。因為在我看來，在近現代中國歷史上，革命興衰和文化變遷是如影隨形、互為因果的。如果我們不從這個角度去看歷史，我們的知識和認識就會有很大的局限。

1949年共產黨幹部離開山東農村根據地，南下接管杭州。進城伊始，他們就面臨著重建政權、恢復經濟的重任，同時也馬上感受到異質文化的衝擊。革命文化與「不革命」文化、鄉村文化與城市文化、齊魯

文化與江南文化、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在此相遇、衝突、互動、磨合。本書要研究的是，文化差異是否是南下幹部遇到的一個重要問題？南下幹部是否曾經從文化入手，來展開對城市社會的革命化改造？人們通常認為，革命會破壞傳統文化。可是共產黨人是否也曾認識到傳統文化對其個人和城市的價值，從而刻意地保留、保護一些傳統文化？接管杭州的共產黨人，帶有強烈的使命感，要以革命精神來改造城市文化。但是城市文化極富彈性，它在被改造的同時，是否也影響和改造共產黨的幹部？換言之，在那個社會劇烈變革的年代，改造者是否也會被改造？城市和幹部是否也同時經歷著蛻變？這些問題，其實也是革命史學者長期以來在理論上所關切的。無論研究法國大革命還是俄國十月革命的學者都在追問：革命勝利了，革命還能繼續嗎？革命者成了執政者，革命就死亡了嗎？³

在美國的中國學中，革命史研究佔有特殊的地位。由於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特殊道路、成就和問題，使其比其他大國和文明（如印度和蘇俄）吸引更多學者和公眾的興趣。1970年代以來，在所謂「革命範式」的指導下，美國歷史學家研究中國革命的起源、發展，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勝利的的原因。對各種因素的探討，諸如蘇俄的援助、共產黨超強的組織能力和宣傳動員能力、中國的「農民民族主義」、共產黨的社會改造項目（減租減息、土地改革）等，幾近窮盡。與此同時，一些學者又分別著力於各個根據地的實證研究，力圖證明在中國不只有一個共產主義革命，而是有許多不同的地方革命。從1980年代後期開始，「革命範式」史學開始受到批評。新一代的歷史學家質疑，只研究幾個或幾十個中共領導人的活動，究竟能幫助我們對中國了解多少？他們呼籲研究「中國革命的社會史」，深入調查由革命引起的社會、習俗、風貌、共識、網絡變化等。不過，在這一方面的研究，進展尚不顯著。

1990年代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國家的解體和相繼崩潰，引起人們對「革命」的整體反思。在美國當代中國史研究中，出現所謂的「範式危機」。首先突破「革命範式」的是「打破1949分界」的史學觀。這一觀點認

為，1949年的革命，並沒有隔斷中國的歷史，革命並沒有完全「改天換地」。對史學研究來說，中國經濟、文化以及社會形態的繼承性、連續性更為重要。當1953年墨菲 (Rhoads Murphey) 出版《上海——現代中國的鑰匙》(*Shanghai: Key to Modern China*) 一書時，多數人不以為然。學者們認為，上海是一隻牛虻，而中國是一頭大象。不管牛虻如何活躍，也不能推動一隻大象。當時普遍接受的觀點是，推動中國發展的不是上海，而是毛澤東領導的農民革命。但是，伴隨著中國的經濟改革，這種觀點的影響逐漸消退。2010年，波士頓大學歷史系開設專題課，討論「上海——現代中國的鑰匙嗎？」至此，許多學者承認，中國近現代歷史的主流和不可逆轉的趨勢，是以上海為代表的現代化進程，而毛的革命只是暫時打斷這一進程的插曲。基於這一認識，對中國近代開埠城市 (特別是上海) 的重新發現和重新評價，以及對外國在華租借地的文化懷舊，成了1990年代後美國中國學的熱點。

中國的改革開放，給歷史研究提出新的課題。隨著中國大陸檔案的進一步開放，以及私人檔案和口述史等新史料的廣泛披露，學者們得以研究中國社會的各個側面和細小分支。這些側面和細節，在不同程度上反映著中國現代化的進程。那些與商業、消費、娛樂、城市化、印刷文化、現代設施、婦女以及新興職業發展相關聯的歷史更得到前所未有的注視。至此，「現代化範式」取代「革命範式」，成為目前美國中國學研究的主流。

眾所周知，範式是一種統治力，它不僅指導而且控制著學術研究的規範和走向。研究生的論文、學者研究經費的申請、學術論文的發表都必須符合現行範式的要求，從而促成了學術注意力的轉向和學術人物的薪火傳代。因此，在可以預見的將來，在美國中國學領域中，關於現代化的歷史研究和文化研究將佔有學術出版物的多數席位。

「現代化範式」的出現，會引導研究者關心新的問題，挖掘新的史料，建構新的歷史。但是，它不僅沒有終結革命史的研究，而且使人們看到更多的問題需要探討。其中，中國革命和中國現代化的關係、中國

革命和中國文化的關係等都是迫切需要研究的問題。例如，中國當前的改革開放是對中國革命的全盤否定，還是中國革命的必然延伸？20世紀中期的上海和延安是兩個分裂的中國嗎？中國的現代化阻止還是催生革命的發生？中國的革命打斷現代化的過程，還是為現代化鋪開道路？中國革命為何需要一個外來革命理論的指引？這種革命如何滲透進傳統文化，傳統文化又如何扭曲革命？中國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是如何生成和變化的，又是如何傳承到後革命時代的？回答這些問題和其他許多相關問題，不僅需要科學理論的討論，也需要歷史的實證研究。一方面，新的史料的不斷發現，會加深我們對中國革命的認識；另一方面，文化研究的成果，又會拓展我們的思路和視野。新的革命史研究，將是融會政治史、社會史、文化研究的綜合努力。我以為，這本關於共產黨接管杭州的著作，應該算是較早向這一方向努力的探索之作。這也是它為學術界所關注的原因之一。共產主義革命，已經成為中國最重要的歷史遺產。無論是它的支持者還是反對者，都無法否認它對今日中國人的思維方式、是非觀念、行為作風以及改革開放軌跡的巨大影響，也無法否認研究它的重要性。因此，中國革命史的研究，也必然是「柳暗花明又一村」。

我在寫作這本書的時候，採訪過許多創造和見證這段歷史的老前輩。其中一些人，在我採訪之後，先後離我們而去。除了對他們表達思念和敬意之外，我也深感歷史學家收集和研究當代人口述歷史的迫切和責任。拙作經中共中央黨校李國芳副教授譯出。他的譯文準確流暢，使本書生色不少。更令我感佩的是，作為一名嚴謹認真的歷史學者，李教授在翻譯文稿時，還幫助我核對出處，勘正遺誤。對本書的中文版，他貢獻良多，我謹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。李教授的譯文力圖把英文原著的資訊和含義，都傳遞給中文讀者，以促進他們的理解和思考。比如對本書副標題“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”（「城市改造與幹部蟬變」）的翻譯，便是一例。我在用“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”為副標題時，意欲揭示一個歷史悖論：即革命者轉變城市，而城市也轉

變了他們。這就像在其他的歷史劇中頻頻發生的“educators are educated”（「教育者也被教育」）或“victimizers are victimized”（「迫害人者自己也被害」）。“Transformation”一詞是中性的，既沒有「嬗變」暗含的異化變質之貶義；也不完全是「蟬變」包含的脫胎換骨、化蛹為蝶之褒義。它只是顯示了歷史的雙向張力導致的雙重結果。接管杭州後，城市舊貌換新顏，幹部也發生複雜變化。對其之不同評價，凸顯了以文化研究切入革命可能帶來的爭議性和深刻性。雖然“transformation of cadre”和「幹部蟬變」中英文之間尚有細微差異，但是，李教授譯為「蟬變」的標題更為醒目，也更發人深思。與此同時，讀者若能聯繫到我使用“transformation”隱含的歷史悖論意義，對「幹部變化」這一重要主題，必有更加深層的思考。

高崢

2019年於美國馬里蘭

註釋

- 1 魏斐德應夏威夷大學出版社要求，為本書英文版所寫的封底評語。
- 2 鮑德威的書評，載於 *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*, Vol. 11, No. 2 (Fall, 2004), p. 339.
- 3 Robert Michels 對於歐洲革命的著名論斷。轉引自 Maurice Meisner, *Mao's China and After: A History of the People's Republic* (New York: Free Press, 1986), p. 56；杜蒲、李玉玲譯：《毛澤東的中國及後毛澤東的中國：人民共和國史》（成都：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92），頁73。